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六卷

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高丙中 主编

高丙中 纳日碧力戈 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课题得到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资助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学术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任：马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星 高丙中

麻国庆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出版说明

自1985年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发展跨学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十余年来，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指导下，我所教学与研究人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与经验探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发展类型研究、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当代文化变迁以及乡村教育、环境、人口等关系到重大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的领域里从事研究工作。在各个专题的研究中，我们注重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发挥研究人员的不同学科专长和多学科的交叉，初步展示出自己的学术风格。这一风格的基点是费孝通教授几十年来提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并举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

在从事大量实地调查和专题研究之后，我所教学与研究人员深感有必要使学科建设和理论探讨进一步系统化，以便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论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自1996年起以本所为基地编辑出版“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为上述努力提供一个学术园地。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为社会学人类学学术丛刊，由我所研究人员组成“论丛学术委员会”，在启动之后，计划每年出版一至两卷。适逢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本论丛学术委员会决定将纪念文集列为第1卷。这1卷体现了我所的基本研究特

点和学术取向。在此之后，“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将着重刊载包括以下内容的研究论文：（1）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2）在具体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人类学分析；（3）人类基本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理论与经验探讨；（4）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仪式象征体系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5）社会、文化与经济过程和生态体系的关系研究；（6）族群之间社会文化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7）少数民族与少数者人群研究；（8）社会与文化变迁、发展、现代化历程的分析；（9）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亦拟收编出版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述评、学术专题论文、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名著书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动态、社会学人类学文献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以费孝通教授为学术指导，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与教学人员负责编辑。本论丛的基本目标在于：展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及有志于共同事业的其它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图创立规范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强调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使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能够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并促使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立足于国际学坛。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学术委员会

1996年5月

前 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最直观地反映在生活世界的改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从汉唐盛世以迄晚清，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没有太大的改观，其普遍的典型的形态可以从这些诗句中感觉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可是，近、现代的短促历史却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我们的许多代祖先浸润其中的生活情境现在仅残存在我们的边缘社会，主流社会的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了。村酿的浓香被啤酒的泡沫和“人头马”的广告氛围淹没了，牧童现在大多在学校里读书；城市的灯火掩盖了月光，或者是城市建筑遮挡了日出月落的景致，天空的飞鸟已被工业尘埃所代替，江河湖泊基本上已无鱼可捕；古道已经被高速公路所取代，帆船、马匹已经被火车、轮船、飞机所取代……。

尽管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始终是波澜起伏的，但其变迁的剧烈程度以当代最甚。从生活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当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前30年”和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近20年”。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民族生活方式在这两个阶段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各家各户过日子”，到“大家一起过日子”的转变，再从“大家一起过日子”向“各家各户奔小康的转变”。

前30年的中国社会及其民族生活方式经历的一次转型从时间序列来看，先是制度革命，再是文化革命。制度革命作为运动主要集中在50年代，由此建立了全国一致的以集本所有和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劳动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生活方式。文化革命作为运动集中在60年代，由此建立了全民一致的以平均主义和所谓劳动人民本质为特征的物资消费生活方式和娱乐生活方式。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在追求社会进步，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是在谋求国家的社会整合。如果说制度建设是要把人组织在一起，那么文化整合是要把人心凝聚成一体。这一时期国家特别关注对于物资消费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被意识形态化、平均化和标准化了。这是国家推行的社会整合在生活方式上的极端表现。因此，中国的消费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奇的特征，如社会上流行标准服装、标准发型，等等。消费是反消费主义的，消费不是个人趣味的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道德品质和思想觉悟的问题，也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因此，社会上有一股很强的政治压力制约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可是，消费是体现个人生活乐趣的领域，人们是不甘心放弃这份自由的。消费欲望经过压抑之后再迸发出来，其能量是惊人的。

近2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增长，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生动地体现了“有容则大”的古典智慧，给社会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来说，“开放”二字尤其意味深长。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对民族传统的开放，不断扩大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民族生活方式因而发生了全面而彻底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轨迹大致是：一、从社会中心话语来看，中国社会发生了从以生产为中心话语向以生活为中心话语的转变。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前30年的公共场所充满了“抓革命，促生产”、“奋战

“××天，向国庆×周年献礼”之类的口号，近20年的公共场所和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商品广告，名牌商品和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明星成为社会注意的中心。二、从生活方式的主体来看，前30年与近20年的民族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发生了从普遍化向特殊化的转变，即从全民化向地方化的转变，从大群体向小群体的转变，从集体化向个人化的转变，从群体向个体的转变。三、从生活方式的活动模式来看，在我们涉及的两个阶段，民族生活方式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一式的标准化向选择式的多样化的过程。在前30年，政府推动各地的民族生活方式向“科学的”、“进步的”方向发展，结果是向统一的标准化发展。近20年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全面恢复，外来文化的全方位引进，人们的活动模式具有越来越丰富的选择式，个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国家对社会活动模式的态度和策略也在由标准化向多样化演变，现在已经大致呈现三个层次：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如见义勇为的行动；国家允许的，如正式的宗教信仰活动；国家容忍的，如各地的民间信仰活动等。

中国生活方式的世纪巨变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剧烈的文化震荡，并且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一巨变之中。无论你对这一过程是怀有研究兴趣，还是具有切身利益；无论你是关心国家命运、人民幸福，还是仅仅在意个人的生活，你都会重视中国的民族生活方式的这种变迁、转型。十多亿人口的生活变化是值得世人特别关心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现代化与中国的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是充满魅力的，也是可以获得广泛的共鸣的。我们深知，这是一个好题目，却不容易作出好文章。

当代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地区、群体和个人身上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在通都大衢与僻壤穷乡之间，在各民族之间，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都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对于调查研究来说，人们有多种切入角度的选择。我们的课题是偏重少

数民族的。我们在总论部分（前三章和最后一章）讨论了有关生活方式及其变迁的一般理论问题和中国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总体过程和特点，而个案部分（第四至第十章）是七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方式变迁的调查报告。这些民族是西部的土族和藏族，南方的尼族、苗族和瑶族，北方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

本书的分工是这样的：高丙中撰写第一章“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第二章“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型”、第三章“当代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转型”和第四章“土族生活方式的变迁：青海五十村和鲍家村的例子”；李丽撰写第五章“藏族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青海果洛的例子”；郭振华撰写第六章“哈尼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云南奕村的例子”；杨庭硕撰写第七章“苗族生活方式的变迁：贵州杉坪的例子”；邓建富撰写第八章“瑶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广西木横冲的例子”；色音撰写第九章“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内蒙新巴尔虎右旗的例子”；纳日碧力戈撰写第十章“鄂温克族猎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内蒙敖鲁古雅的例子”和第十一章“结语：关于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变迁的几点讨论”。高丙中是课题负责人，并在最后对全书进行了统稿。这项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笔者在诸多方面深感不足。我们想聊以自慰的是：让我们只是把它看作此类研究的一个开端好了。

这项研究得到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多方面支持，其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所长（以及青海民族学院的秦永章先生）直接参与了对于青海土族的调查，该所资料室、电脑室的同志给予了大量帮助，我们在此对这些单位和有关的领导、同志和朋友表示深切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1)
第一节 生活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2)
第二节 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流变.....	(4)
第三节 中国生活方式研究的状况.....	(26)
第二章 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型.....	(41)
第一节 民族生活方式转型的社会文化问题.....	(43)
第二节 建立民族生活方式转型理论的尝试.....	(71)
第三章 当代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转型.....	(83)
第一节 革命年代生活方式的变迁.....	(84)
第二节 开放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	(100)
第四章 土族生活方式的变迁：青海五十村和鲍家村的例子.....	(120)
第一节 劳动生活方式.....	(123)
第二节 社会政治生活方式.....	(127)
第三节 物资消费生活方式.....	(130)
第四节 文化娱乐生活方式.....	(136)
第五节 关于土族现代化变迁的讨论.....	(158)
第五章 藏族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青海果洛的例子.....	(162)
第一节 研究对象简介.....	(164)

第二节	劳动生活方式的困境与出路.....	(167)
第三节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	(177)
第六章	哈尼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云南奕村的例子.....	(198)
第一节	调查对象简介.....	(198)
第二节	奕村的生活方式.....	(201)
第三节	关于奕村生活方式变迁的讨论.....	(225)
第七章	苗族生活方式的变迁：贵州杉坪的例子.....	(229)
第一节	调查对象简介.....	(229)
第二节	从远古到近代的生活方式.....	(234)
第三节	从近代到现代的生活方式.....	(248)
第四节	对杉坪生活方式变迁的讨论.....	(260)
第八章	瑶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广西木横冲的例子.....	(265)
第一节	劳动生活方式的变迁.....	(268)
第二节	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变迁.....	(278)
第三节	物资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	(285)
第四节	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变迁.....	(292)
第五节	几点议论.....	(297)
第九章	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内蒙新巴尔虎右旗 的例子.....	(299)
第一节	古代至解放前的生活方式概述.....	(299)
第二节	50至70年代生活方式的变迁.....	(305)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的变迁.....	(309)
第十章	鄂温克族猎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内蒙敖鲁古雅 的例子.....	(328)
第一节	社会生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	(331)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现状.....	(343)
第三节	关于鄂温克族猎民生活方式变迁的讨论.....	(351)

第十一章	结语：关于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变迁的 几点讨论.....	(355)
第一节	不同视角下的时间观念及其定位.....	(355)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问题.....	(359)
第三节	作为象征体系的传统生活方式.....	(362)
第四节	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的相关性.....	(367)
第五节	现代化与生活方式变迁是一个过程.....	(373)

第一章 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而这种存在首先是一种自在的过程，通常在这种过程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在我群与他群的存在方式的对比被意识到的时候，群体内会产生对生活方式的自觉，并进而引起对生活方式的关注、议论和变革。中国有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并且，这一方式不断在内部力量的推动之下，不断在吸收外来因素、迎接外来挑战的过程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关怀社会生活方式的传统：儒家对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的重视、建设和维护是这个传统的主流；而杜甫“致书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所表现的改造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和物资方面的缺失的意愿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的典型代表。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关怀大都以实践为指归，并不导向理论研究。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研究首先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出现，并且是在社会学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

社会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在当代形成了世界性的热潮。二战结束以来，先是在西方，接着在前苏联及东欧，继而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生活方式都是学术界和传播媒介的热门话题。在这些地区，由于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结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存在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也就

不同，知识分子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取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从学术史来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生活方式的论述。

第一节 生活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据统计，使用这个概念的著作达17篇之多），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生活方式”概念。

其一，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阶级的论述都是公认的学术经典，并且一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划分阶级，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但是，阶级的社会属性远远不止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把生活方式用作辨别阶级的重要特征。例如，马克思对法国农民阶级的分析就采用了生活方式这一指标。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当时法国的农民阶级与其他阶级各不相同，一方面从逻辑上说，是由他们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从现象上看，是由

姚永杭《生活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讲演录》第100页，上海社科院情报所编。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表现出来的。可见，生活方式在这里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区别阶级的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指标。

其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两层意思分开来说。首先，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写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看出，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总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

第二层意思则是：生产方式也是人的活动方式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还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在更大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生活的一定形式”，最后又明确地说是“一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生活方式”概念不仅是指衣食住行之类的日常生活，它涵盖着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整个生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用“生活方式”的两种意义为后世奠定了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在西方社会，从马克斯·韦伯以来，生活方式的研究是沿着把生活方式视为阶级辨别指标的思路发展变化的。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研究则是以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为基础的。

第二节 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流变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生活方式是辨别阶级的有效指标。这种思路后来在韦伯和凡勃伦的笔下发展成为专门的研究，使生活方式开始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韦伯在一篇题为《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文中谈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时引入“生活方式”概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韦伯认为，阶级是指相同阶级处境（class situation）中的所有人，而阶级处境是“那种典型的获取商品供应、外在生活条件及个人生活经验的机会，至于这种机会，则是由一定经济秩序中利用商品或技能以换取收入的权力的大小和类型所决定的”。韦伯又说，“相对于由经济决定的‘阶级处境’来说，我们拟用‘地位处境’（status situation）指人的生活际遇的一切典型成分，此类成分是由关于荣辱的社会评价（肯定的或否定的）所决定的。

同样的内容见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1, part one, Chap. , "Status Groups and Classes", Bedminster Press, 1968, pp.302 - 307.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181 - 191.

... .. 在内容上，地位的荣辱通常表现于这一事实：一定的生活方式（styles of life）能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期盼，以至他们都希望属于这个圈子”。也就是说，社会地位的尊卑是由生活方式的高低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的范围是由特定生活方式的圈子所标志的。

生活方式的一致形成地位群体，地位群体以生活方式的认同为内部凝聚和外部排斥的机制。韦伯是这样论述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地位受尊敬的程度的决定作用意味着，地位群体是一套‘习俗惯制’（conventions）的专门拥有者。如此说来，生活的全部‘风格化’（stylization）来源于地位群体，或者，至少可以说，表现于地位群体”；“地位的社会分层是与对于观念的和物质的产品或机会的垄断并存的。... ..除了特定的地位的荣誉——它总是依赖一定的距离和排外性，我们还看到各种对于物质的垄断。此类受羡慕的爱好可能包括若干特权，如穿特殊的衣服，吃特殊的、对外人来说禁忌的食物，携带武器”。因为荣誉源于群体的组成，并且，地位群体要求其成员共享一种特定的生活风格，所以生活方式就可以视为对该群体加以描述的具体表现——人们能够通过这些表现分辨该地位群体的社会构成。既然生活方式在这种体现社会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么，有影响的地位群体对各种炫耀性的生活方式因素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垄断就不足为奇了。

韦伯总结说，“我们于是可以非常简洁地说，‘阶级’是按照它们与商品生产和商品获取的关系而划分的；而‘地位群体’是按照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p.186 - 187.

From Max Wed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190.

From Max Wed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p.187 - 188.